

语言资源与语言规划丛书

徐大明 方小兵 主编

语言政策

Language Policy

[美] 戴维·约翰逊 著
方小兵 译
张治国 审订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
语言资源与语言规划丛书

徐大明 方小兵 主编

语言政策

Language Policy

[美] 戴维·约翰逊 著
方小兵 译
张治国 审订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专项资金、南京大学
“中国文学与东亚文明协同创新中心”资助出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京权图字：01-2016-5617

© David Cassels Johnson 2013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Palgrave Macmillan,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under the title Language Policy by David Cassels Johnson. This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Palgrave Macmillan. The author has asserted his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言政策 / (美) 戴维·约翰逊 (David C. Johnson) 著; 方小兵译.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6.10

(语言资源与语言规划丛书 / 徐大明, 方小兵主编)

ISBN 978-7-5135-8244-5

I. ①语… II. ①戴… ②方… III. ①语言政策—研究 IV. ①H0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69992 号

出版人 蔡剑峰
责任编辑 张立萍
封面设计 高蕾
版式设计 吕茜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址 <http://www.fltrp.com>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0
版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5-8244-5
定价 48.00 元

购书咨询: (010) 88819926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 <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 (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 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 (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 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 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斌律师

物料号: 282440001

顾 问 (按姓名音序排列)

陈 骏、陈章太、戴庆厦、李 崑、李宇明、穆夫温 (Salikoko Mufwene)、
斯波斯基 (Bernard Spolsky)

主 编

徐大明、方小兵

副主编

王铁琨、姚小平、范德博 (Marinus van den Berg)

编 委 (按姓名音序排列)

蔡永良、陈 敏、陈新仁、丁言仁、范德博、方小兵、葛燕红、
顾利程、郭龙生、郭 熙、刘丹青、刘 骏、王海嘯、王建勤、
王 琳、王铁琨、吴志杰、徐大明、徐建中、姚小平、张治国、
赵蓉晖

和谐语言生活 减缓语言冲突

——序“语言资源与语言规划丛书”

语言（也包括文字）职能主要分工具和文化两大范畴，且这两大范畴又都有显隐二态。就工具范畴看，语言作为显性的工具是用于交际，作为隐性的工具是用于思维。就文化范畴看，语言既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文化最为重要的承载者，这是语言的显性文化职能；语言的隐性文化职能是起到身份认同、情感依存的作用。

百余年来，中国因语言国情所定，一直侧重于从显性工具的角度规划语言，要者有四：其一，统一民族语言和国家语言，消减因方言、语言严重分歧带来的交际障碍。其二，进行汉字的整理与改革，为一些少数民族设计文字或进行文字改革；当年还为这些文字全力配置印刷设备，近几十年专心于进行面向计算机的国际编码，使中华语言文字进入电子时代。其三，探索给汉语拼音的各种方法，最终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使国家通用语言有了优越的拼写和注音工具。其四，大力开展外语教育，以期跨越国家发展中的外语鸿沟。这些语言规划，保证了国家政令畅通，为各民族、各地区甚至为海内外的相互交流提供了方便，为国家的信息化奠定了基础，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做出了贡献。

这些语言规划主要是改善语言的工具职能，当然也兼及语言的文化职能，比如一些少数民族的语音、文字规范化工作等。当今之时，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已经成为毋庸置疑的强势语言，全国已有 70% 左右的人口能够使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已是响彻大江南北的时代强音。当此之时，当此之世，语言规划也应当以时以势逐渐调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工作重心应由“大力推广”向“规范使用”转变；语言规划在继续关注语言工具职能的同时，要更多关注语言的文化职能。

规划语言的文化职能，首先要坚持“语言平等”的理念。语言平等是民族平等的宪法精神在语言政策、语言观念上的体现。要尊重各民族的语言

言文字、珍重各民族的方言，同时也要平心对待外国语言文字。

其次要具有“语言资源”意识。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包括方言土语），贮存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过程和“文化基因”，镌刻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文化身世说明书，滋养着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科学卫护她，传承研究她，开发利用她。

再次要理性规划“语言功能”。由于历史上的多种原因，各语言的发育状态和能够发挥的语言职能是有差异的，比如，在使用人口多少、有无方言分歧、有无民族共同语、有无文字、拥有的文献资料、适用的社会领域等方面，都各不相同或者大不相同。因此，应在“语言平等”理念的基础上，根据语言的实际状态进行合理有序的语言功能规划，使各种语言及其方言在语言生活中各自发挥其应当发挥的作用。

最后要遵循“自愿自责，国家扶助”的方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各民族如何规划自己的语言，民族自治地方如何规划自己的语言生活，应当按照本民族本地方的意愿进行决策，并为这些决策负责。当在进行和实施这些决策而需要国家帮助时，国家应依法提供智力、财力等方面的援助与扶持。

中国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多文字的国度，拥有丰富的语言文字资源，但也存在着或显或隐、或锐或缓的多种语言矛盾。对这些语言矛盾认识不足，处理不当，就可能激化矛盾，甚至发生语言冲突，语言财富变成“社会问题”。语言矛盾是社会矛盾的一种，也是表现社会矛盾的一种方式，甚至在某种情况下还是宜于表现社会矛盾的一种方式。近些年，中国的各项改革都进入了“深水期”，语言矛盾易于由少增多、由隐转显、由缓变锐，许多社会矛盾也可能借由语言矛盾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中国也可能进入了语言矛盾容易激化甚至容易形成语言冲突的时期。

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科学地进行语言规划，特别是重视对语言文化职能的规划，重视从语言的隐性文化职能上进行语言规划，就显得尤其重要。这就需要深入了解语言国情，工作做到心中有数，规划做到实事求是；这就需要着力研究语言冲突的机理，透彻剖析国内外语言冲突的案例，制定预防、处理语言冲突的方略，建立解决语言矛盾、语言冲突的有效机制；这就需要密切关注语言舆情，了解社会的语言心理及舆论动向，见微知著，提高对语言冲突的防范应对能力。当然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提高全社会的语言意识，树立科学的语言观，特别是树立科学的语言规范观和

语言发展观，处理好中华各语言、各方言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本土汉语与域外汉语的关系，处理好母语与外语的关系，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并通过语言生活的和谐促进社会生活和谐。

中国的改革开放表现在方方面面，但更重要的是思想上、学术上的改革开放。语言规划是社会实践活动，同时又是一门科学。徐大明先生具有中外语言学背景，不仅自己学有专攻，而且数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外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具有学力、眼力和行动力。他所主持的“语言资源与语言规划丛书”此时出版，恰得其时，相信能为新世纪的中国语言规划起到重要的学术借鉴作用。

李宇明

2012年12月12日

序于北京惧闲聊斋

中文版前言¹

我的职业生涯是从当英语教师开始的，最初是在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的一所小学为孩子们教授英语课程，他们的母语大多不是英语。我几乎没有接受过什么教师培训，但这似乎并无大碍，因为那时对英语教师的需求很大，即使是刚刚迈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也有希望得到这份工作。中国（以及世界许多地方）在选聘英语教师时，对那些来自英美等国的应聘者情有独钟——尽管有的人没有任何教学经验，我想中国读者都很了解这一点，其实这些都是糟糕的语言政策所导致的后果。它一方面延续了不公平的语言等级制度和不平等的社会语言权利，另一方面不利于保证教育上的真正平等。当初我并不明白这一点，但在西雅图的教学经历使我对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产生了兴趣。对我而言，语言教育上存在的问题就是社会公平正义缺失的表现，应该在日常工作中努力促成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这正是支撑我从事这一事业的动力，也是激励我撰写这本《语言政策》背后的驱动因素。

在本书出版之前，读者就已经可以看到几本与本书同名的著作，其中比较重要、比较有影响力的当属伯纳德·斯波斯基的《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和艾拉娜·肖哈米的《语言政策：隐意图与新方法》（劳特利奇出版社，2006）。所以当初我开始写这本书时，确实有些诚惶诚恐。最早向我提议撰写此书的是克里斯托弗·坎德林，当时他和戴维·霍尔正在合作编辑“应用语言学研究和实践”系列丛书。他曾看过我发表在《语言政策》期刊上的一篇文章，于是建议我撰写一本有关这一主题的专著，收入他们的丛书。两位主编对本书的内容和结构提出了宝贵的建议，正是因为他们的不断鼓励和促进，本书才得以完善，并能够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创新。如果这本书真的有些价值，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他们的建议、鼓励和批评。碰巧的是，坎德林也是詹姆斯·托尔夫森（James Tollefson 1991）的《规划语言，追求平等：社

1 本书所有脚注皆为译者注，下文不再注明。

区中的语言政策》一书的主编，那确实是一本极其有影响力的著作。坎德林 and 霍尔都为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领域的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让人深感遗憾和极其痛心的是，在我为这部中文版《语言政策》写序言前，两位已经离开了人世——就在本书的英文版出版后不久。

当初我之所以接受坎德林的邀请，撰写《语言政策》这样一本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我想要写一本什么样的书，而现在写成的这本书也正是我在读博期间很想读到的一本书。记得我在撰写博士论文时，认真读过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领域许多优秀的专著和编著，其中包括库珀 (Cooper 1989) 的《语言规划与社会变迁》、托尔夫森 (Tollefson 1991) 的《规划语言，追求平等：社区中的语言政策》、希夫曼 (Schiffman 1996) 的《语言文化和语言政策》、卡普兰和巴尔道夫 (Kaplan and Baldauf 1997) 的《语言规划：从实践到理论》、托尔夫森 (Tollefson 2002a, 2013a) 的《语言教育政策：关键问题 (第二版)》、斯波斯基 (Spolsky 2004) 的《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肖哈米 (Shohamy 2006) 的《语言政策：隐意图与新方法》以及里森托 (Ricento 2006a) 的《语言政策导论：理论与方法》。应该说，所有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专业读物，然而，这些著作大多专注于本领域的某个主题，抑或重点讨论作者提出的重要概念或独到见解，而我希望看到的是这样一本书：它既能整合各种观点和视角，综述竞相争鸣的各种理论模型，又能通过概述的方式，为刚刚进入语言政策研究领域的人员展现一个简明、实用的研究全貌。正因为如此，在撰写本书时，我特别注意总结语言政策的研究方法，以便为读者提供切切实实的指导。这正是我和弗朗西斯·胡尔特所编著的另一本书《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的研究方法：实用指南》(Hult and Johnson 2015)¹要传达的主旨，该书刚刚由约翰·威利父子出版社出版。

中国的读者会注意到，除了第3章潘琳的案例外，本书较少涉及中国的语言政策。其实，中国语言政策的研究是一个亟待开挖的富矿，尽早开始研究应该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一些人很可能会专注于中国的英语教育政策，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语言极其丰富的国家而言，其实存在各种各样的潜在研究途径。我期盼有朝一日能够阅读中国学者出版的介绍中国语言理念和语言政策的读物。

1 原书中的文中央注和参考文献均将这本书的出版年份标注为2013年，实际上该书直到2015年才由约翰·威利父子出版社出版。译者按照实际出版情况做了修订。

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决定将本书纳入他们的“语言资源与语言规划丛书”，本人对此深感荣幸。非常感谢方小兵博士能够承担本书的翻译工作，我知道，书中涉及大量的术语、定义和案例，在语言转换时必定会遇到很多麻烦，翻译过程必然十分艰辛。同时，我也衷心感谢本书的审订者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是他们让更多的中国读者了解本书。

戴维·约翰逊 (David Johnson)

2016年1月

于美国爱荷华大学

本书献给南希 (Nancy)、丽贝卡 (Rebecca) 和汤姆 (Tom)

致 谢

我们在生活中遇见的每个人究竟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行为和创作的，这些谁能知道？T.S. 艾略特曾经写道：青涩诗人纯粹模仿，成熟诗人偷师学艺（这句话常被误引为“坏诗人效仿而好诗人窃取”，但或许效果反而更佳）。如果事实果真如此，而且目标就是成为一名“成熟的诗人”，那么让我自豪的是，就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曾偷师学艺于当今众多的大师，其中三人已在我的献词中提及，他们是南希、丽贝卡和汤姆。我得到的指导和启示主要来自他们，没有他们我无法完成这本书，或者至少出来的书会完全不同，也达不到现在的水准。巴赫金（Bakhtin）说过，我们所说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是完全原创的，它们在文本的互文性（intertextual）和话语的互语性（interdiscursive）方面都与他人以及与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巴赫金是对的，那么帮助我完成这本书的人真可以说是无以胜计。我虽不能一一列举，但还是会尽量列出。

首先，我想感谢本书编辑克里斯托弗·坎德林（Christopher Candlin）和戴维·霍尔（David Hall）。如果这本书确实不错，那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漫长的编辑过程中他们所给予的帮助，包括尖锐的批评、有益的建议和持续的鼓励。这些让我能够做到既思绪周密又不乏创新，对此我真的不胜感激。如果此书确实不够好，那么责任全在于我自己。

接下来，我想感谢我的同事、合作者以及挚友弗朗西斯·胡尔特（Francis Hult）和埃里克·约翰逊（Eric Johnson）。在过去十年间，弗朗西斯和我一直保持着学术对话，其中涉及本书中的许多话题。虽然这些对话对本书的影响并不总是那么显而易见或易于验证，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对话，本书就不会也不可能现在有这个样子。我和埃里克是后来才认识的，但是我们对华盛顿州的语言政策进行了不间断的合作研究，由此带来的各种发现和相关概念在全书各个章节中都有所呈现。

在第3章，我展示了一些新颖而且有趣的语言政策研究项目，它们包含了许多创新性的概念和研究方法，还揭示了一些耐人寻味的发现。尽管只是系列研究中的一小部分，但我相信它们已经指出了本领域的一些发展

方向,这些趋势富于时代特色,前景令人心驰神往。在回顾这些研究的过程中,我受到许多研究者的启发,得以在全书中将各种案例关联起来。其中一些作者我很熟悉,而另一些则素昧平生,但是我仍想感谢所有研究人员,尤其是玛丽琳·马丁-琼斯(Marilyn Martin-Jones)、安吉拉·钦科塔-舍吉(Angela Cincotta-Segi)、弗洛伦斯·博纳奇纳(Florence Bonacina)和弗朗西斯(Francis)。他们有的曾经给我发来自己出版物的电子版,有的甚至寄来精装纸质版著作。

其他同事和合作者也对本书的出版贡献良多。我从他们的电子邮件、会议展示、学术讨论以及忠告和启示中获得过各种帮助,其中一些人还曾热心地给我邮寄他们论文的复印件。在这里,我想感谢那些曾经启发和帮助过我的学者,他们是哈罗德·希夫曼(Harold Schiffman)、特蕾莎·麦卡蒂(Teresa McCarty)、特伦斯·威利(Terrence Wiley)、布莱恩·弗伦奇(Brian French)和吉姆·托尔夫森(Jim Tollefson)。在撰写各章之时,我经常思考吉姆的观点,尤其是他的《规划语言,追求平等:社区中的语言政策》(*Planning Language, Planning Inequality: Language Policy in the Community*)一书,此书就是我写作的标杆。

我也深深感激那些曾经与我一起工作过的教育工作者。他们不知疲倦,致力于为美国少数民族提供更多的语言教育机会,这于我而言,是一种永恒的激励。美国常常被人刻画为单语国家,但其实许许多多有关才智、有创造力和革新精神的教育家一直在为保护美国学校的多语教育环境进行不懈的努力。他们在工作中经常会遇到政治、教育和财政等方面的困难,需要我们提供这些方面的援助。

华盛顿州立大学及该校教育学院为本书研究提供了部分资金,在此我十分感激。我尤其想感谢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同事们——帕姆·贝蒂斯(Pam Bettis)、道恩·夏因(Dawn Shinew)、汤姆·索尔兹伯里(Tom Salsbury)和乔伊·埃格伯特(Joy Egbert)。他们是如此支持我的工作,以至于我感到每天走进办公室都成为一件很开心的事。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感谢父母对我始终如一的鼓励(尽管他们压根儿不会去读这本书,我也决不责备他们);感谢爱妻布林达(Brinda)总是支持我并容忍我逃遁于象牙塔;最后要感谢我的孩子——德维(Devi)和米拉(Mira),他们永远是我的欢欣之泉和灵感之源。没有他们我也可以完成此书——事实上,没有他们,我可以在完成这本书的时间里写出两本书,因为他们就是一个吸入并彻底抹去我的时间、能量和日光的黑洞——但问题是,如果没有黑洞,我们的宇宙将不复存在。

目 录

第一部分 基础研究：定义、理论与概念	1
第1章 什么是语言政策	2
1.1 定义	2
1.2 类型	8
1.3 语言政策范例	11
1.3.1 英语语言政策简史	11
1.3.2 土著语言与相关政策	15
1.3.3 赤道几内亚的石油生产和语言政策	20
1.4 讨论	23
第2章 理论、概念与框架：历史回顾	25
2.1 语言规划研究的起源与早期发展	25
2.2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扩展框架与概念化进程	28
2.2.1 戴尔·海姆斯的社会语言学	29
2.2.2 批评（社会）语言学	30
2.2.3 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扩展框架	32
2.3 批评性语言政策	38
2.4 语言政策的民族志研究	43
2.5 扭转语言转用和语言帝国主义	47

2.5.1 扭转语言转用	48
2.5.2 语言帝国主义	50
2.6 语言生态学	51
2.7 语言教育政策	53
2.8 讨论	56
第二部分 研究发现	57
第3章 案例研究	58
3.1 玛丽琳·马丁-琼斯	
——威尔士双语教育和读写教育	59
3.2 费利西亚诺·钦布泰	
——莫桑比克的殖民历史、语言政策和双语教育	62
3.3 弗洛伦斯·博纳奇纳	
——法语入门课堂中的实践性语言政策	66
3.4 安吉拉·钦科塔-舍吉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语言政策和双语教育	72
3.5 弗朗西斯·胡尔特	
——语言政策、语言生态和瑞典国家电视台	77
3.6 潘琳	
——中国的英语教育与语言意识形态	79
3.7 达夫娜·伊扎崎	
——以色列的语言态度、语言立法和阿拉伯语语言政策	81
3.8 香农·菲茨西蒙斯-朵兰	
——美国的移民和语言意识形态	84
3.9 讨论	87

第4章 发现	90
4.1 语言政策的援用与实施	90
4.1.1 发现1: 语言政策参与者拥有权力	92
4.1.2 发现2: 语言政策在仲裁者和实施者之间权力分配不均	94
4.2 作为权力工具的语言政策	96
4.2.1 发现3: 政府机构通过语言政策进行操控	96
4.3 作为授权工具的语言政策	97
4.3.1 发现4: 国家多语政策确实能为多语教育和少数语种 提供空间	97
4.3.2 发现5: 地方多语政策确实能为多语教育和少数语种 提供空间	99
4.4 语言政策在文本、话语和实践上的多层性	99
4.4.1 发现6: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是相对的	102
4.4.2 发现7: 仅有多语制的宏观语言政策是不够的	102
4.4.3 发现8: 仅有多语制的地方语言政策也是不够的	103
4.4.4 发现9: 中观语言政策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104
4.5 语言政策文本和政策话语的性质	104
4.5.1 发现10: 国家语言政策未必有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	105
4.5.2 发现11: 政策意图尤其难以确定	107
4.5.3 发现12: 语言政策话语自成体裁	110
4.6 结论	111
第三部分 语言政策研究	113
第5章 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	115

5.1 早期的语言规划工作	115
5.2 历史—文本分析	117
5.3 政治法律环境分析	121
5.3.1 司法裁决与法庭诉讼	122
5.3.2 语言政策与政治认同	125
5.3.3 国家认同、公民身份与语言	126
5.3.4 宪法解释与成文法解释	129
5.4 媒体话语分析	132
5.5 民族志研究	136
5.5.1 定义、优势与挑战	137
5.5.2 特征、范围与数据收集	142
5.6 话语分析	144
5.6.1 批评话语分析	147
5.6.2 互文性、互语性和语境重构	150
5.6.3 对批评话语分析的批评	155
5.6.4 语言人类学与言语链	157
5.7 讨论	159
第6章 语言教育政策：行动研究和参与进程	161
6.1 行动研究法	161
6.2 语言政策行动研究	164
6.2.1 语言政策行动研究的循环周期	165
6.2.2 语言政策行动研究的特点	168
6.3 案例分析	170